

憶說張季鸞

樂 恕 人

壽張季鸞

于右任

榆林張季子，五十更風流。
處處忙人事，時時念國仇！
豪情託崑曲，大筆衛神州。
君莫談民立，同仁盡白頭。

終身不仕的名報人

中國報業史上，具有俊整而敦厚的風格，同時又具有卓絕而宏廣的器識的報人，在民國建立前後，可說是「人才輩出」；但我以報界後進，曾經瞻仰過其風采而又敬聆過其高論，使我一生崇拜而懷念的「終身不仕」的報人，就祇有張季鸞先生一位了！

季鸞先生名熾章，原籍陝西省榆林縣，民前二十六年出生在山東省鄒平縣。十五歲時回到原籍就讀「宏道學堂」，成績優異，被保送到日本留學。當年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國勢日強，且一戰勝「大清帝國」，再戰勝「俄羅斯帝國」，浸浸然已成新興列強之一；所以中國朝野對日本「刮目相待」，官方私人，紛紛派遣留學生赴日

本留學，欲以日本富強之道，作為中國建國的模範。

季鸞先生受到國事的刺激，既已赴日留學，正好受到革命思潮對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的洗禮。辛亥革命爆發，武昌起義時期，他就趕回國內，先到上海得到友好介紹，參加革命報業陣營。

在民國建立前，革命黨人于右任先生於一九〇七年二月在上海首創「神州日報」，繼創「民呼報」，和「民吁報」，又再創辦「民立報」。「民立報」由于右任先生任社長，吳忠信、童弼臣先後任總經理，至於編輯部方面，人才濟濟，除了大名鼎鼎的宋教仁、葉楚傖、馬君武諸先進之外，季鸞先生也是其中後起的一員新秀。上面所引于先生「壽張季鸞」五言律詩末句下面，還有作者親註：「季鸞為民立報中舊同事」，即指此一段往事。

「民立報」在當年排滿復漢，創建民主共和國並打擊駁斥「維新派」保皇黨人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君主立憲論」的革命運動中，在那時代「政論性」為主的報刊上，經常發表許多精闢、犀利的社論和專論。

季鸞先生雖參加編輯工作，在他那期間尚未嶄露頭角，還在學習階段。

民國建立後，在臨時約法上，保障人民有出版言論自由。因之在新中國的各地，尤以在沿海的大都會中，新興的報業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其中，在北方的大商埠而又鄰近當年政治重心北京的天津，早在清末光緒二十八年（公元一九〇二）由英欽之先生創辦了「大公報」。英欽之創辦的宗旨是：「目擊庚子之禍，痛國亡之無日，糾資辦報，名以大公。」這是後來季鸞先生與志同道合的朋友胡霖（政之）、吳鼎昌（達詮）共同接辦「大公報」，在發行一萬號紀念的社論中所介紹英先生創辦「大公報」目的所表達的。

「大公報」在清末創立後，經過千辛萬苦十幾年的奮鬥，為了國事的紛亂擾攘，英欽之也因年長力衰，應付政治上的各種干涉阻礙，有心無力；乃於民國十四年冬季停刊。

這時期，季鸞先生在北方，和結識多年的志友胡政之、吳鼎昌正籌劃如何從事「文章報國」的雄心壯志。他們得悉「大公報」不得已而停刊後，對這份具有「報格」的「大公報」，一方面

甚為惋惜，一方面即由友人之介，從英欽之手中，接辦了下來。由吳鼎昌任社長、胡霖任總經理，張季鸞任總編輯，這是民國十五年夏天的事情。

再為鉛刀期挽狂瀾

中國報業史上，吳、胡、張「桃園三結義」，由於三先生職務的分配各得其所，吳在實業界金融界交遊廣闊，籌措辦報的資金，綽有餘裕。胡為人精明幹練，經之營之，局面一新。自然，主持編撰的季鸞先生是本業中的斲輪老手，自然大大發揮了他的長才。三先生同心合力，抱着「再為鉛刀之試，期挽狂瀾之倒。」在民國十五年九月一日接辦「大公報」，恢復出刊時，揭示了「四不」的原則，以宏揚「大公」二字對國家社會，對從業操守上莊嚴神聖的立場。

曰不黨，「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於國者，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曰不賣，「聲明不以言論作交易，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於智識及感情，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曰不私，「本社同人除願忠於報紙固有之職務外，並無他圖。易言之，對於報紙並無私用。願向全國開放，使為公衆喉舌。」曰不盲，「夫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所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語激烈，昧於事實，是謂盲爭。吾人誠不明，而不願陷於盲。」

那時期，北洋軍閥橫行大半個中國，而各地方的軍閥也割地自霸，擁兵禍國。創建民國的「

中國國民黨」，初則偏促廣東一隅，繼則由蔣介石總司令與兵「北伐」，統一了全中國，完成了國父孫逸仙的遺志。

與大公報言論合一

「大公報」不畏北洋軍閥對報界的壓迫摧殘，對報人如京報社長邵飄萍，社會日報社長林白水，不斷作正義無畏的怒吼。不數年間，「大公報」就成為中國報壇上突起的新軍，而季鸞先生主持筆政，名言讜論，不但文采斐然，而且筆力千鈞，光芒萬丈，儼然開始執全國輿論界的牛耳。提起「大公報」，就聯想到季鸞先生。

「北伐」前後，雖然蔣介石總司令已成為國家的新領袖，但在中國國民黨內部，元老們、軍政領袖們，免不了還有紛爭和衝突；外則中國共產黨已成為禍根，而地方軍閥們的殘餘勢力，又有蠢蠢欲動的跡象，使得中央政府在蔣介石總司令主持下，對實施國父的建國歷程——軍政、訓政、和憲政三大時期，不但不能順利推進，而且阻礙重重。

繼之，中共的武裝力量從江西南部流竄到陝北延安一帶，重建根據地；而日本帝國主義者又變本加厲，從外交、經濟、和軍事上着着進逼中國。

民國二十年的「九一八事變」，日本侵佔東北，建立偽「滿洲帝國」之後，又在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發動「蘆溝橋事件」，點燃了中日大戰的戰火。

最高領袖引為誼友

在這個內憂外患紛至沓來的非常時期中，「大公報」在季鸞先生主持筆政下，秉照接辦時的宗旨，對國家社會，對領袖個人，對全國各界，竭盡言責，大公無私，敢言善言，贏得朝野的尊重。

蔣介石總司令以後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及「國民政府主席」時期，對季鸞先生特別敬重，以國士之禮待之。在公的方面言，季鸞先生在「大公報」社論上，秉公直書，並無忌諱；在私交方面，季鸞先生成為我國最高軍政領袖的「誼友」「畏友」，領袖對他極為親近而敬重。

在若干篇社論上，季鸞先生直對領袖稱為「蔣君」或「蔣先生」，祇從這一點上，我們即可知道他的風格氣度。

季鸞先生為了國事，所關發的名言讜論，見於「季鸞文存」一書中，我們至今展卷閱讀，對他的言論文采、風格器識，敬佩萬分。

筆者在「抗戰」前後，曾有兩次機會，瞻仰到季鸞先生的手采，又聽了他的宏論。

第一次是在民國二十四年，正當我在成都唸高中的最後一年。

那時東北三省已被日本佔領，時局因中共流竄經過川境，地方軍閥無力抗拒，恭請中央派軍入川追剿之後，季鸞先生到四川訪問，受到川中各界熱烈盛大的歡迎。

我所就讀的「成屬聯立中學」是西漢文翁石

室的舊址，也是在四川辦得極有聲譽的中學，而且又是全川率先創辦「軍事訓練」的中學。也許爲了這兩種原因，季鸞先生特去參觀，並對全體師生發表演說。我既早已立志從事新聞事業，所以對這位名報人——「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先生的光臨，特別興奮，熱切地期待着。

季鸞先生給我留下的印象，在外貌上他雖然是屬於文雅的學者型，身材略顯弱小，但他在氣度上仍令人覺得彬彬然，凜凜然，既令人親近，又令人敬重。

那天在參觀我們學校後，在簡陋的大禮堂中，對我們近千的師生教職員演講時，從容侃侃地對我們以略帶陝西鄉音的「普通話」，勉勵我們同學，處於嚴重的國難期間，要在「德、智、體」三育上努力。因爲不久的將來，青年人都會是救國報國的先鋒部隊。

季鸞先生回到天津，在「大公報」上發表旅遊四川的觀感，還特別提到參觀成屬聯立中學時，對我們「學生軍」在宿舍中的表現。他對學生們將白色清潔的棉被疊成形成如木箱的整潔美觀，大表讚揚，這也可見季鸞先生對小事也如此留意。

第二次在「抗戰」期中的陪都重慶。「大公報」發軔於天津，繼於民國二十五年又在上海創辦「大公報」，因抗戰爆發，天津上海兩版合併，初遷漢口，後因戰局不利，大武漢失守，被迫遷往重慶。「抗戰」期中的報業，在物質條件上極其艱困，但在精神上則極爲振奮。大後方及戰區中的報業，對「抗戰建國」的歷史使命，無不

傾力以赴；爲了爭取抗戰勝利，建國成功，從業人員不惜以生命貢獻國家。

榮譽歸中國新聞界

民國三十年，「大公報」得到一項極爲崇高的榮譽，那便是美國米蘇里新聞學院以一年一度的國際新聞事業的「榮譽獎章」，頒贈給中國的「大公報」。這件空前的榮譽不但是「大公報」的，也是屬於中國新聞界的；因此，在重慶的「各報聯合委員會」，決定於五月十五日在地址適中的中央黨部大禮堂舉行慶祝大會。因爲戰時的集會，必須要考慮到萬一遇上敵機的空襲時，大家能够即時疏散的安全問題。中央黨部外的大禮堂所在地上青寺，不但交通方便，而且附近又有廣大安全的防空洞。

慶祝盛會那天，冠蓋雲集，新聞界更是喜氣洋洋。各報出了特刊，我們中央政治學校（現在「國立政治大學」的前身）學新聞的畢業同學，當年曾在重慶創辦了「新聞戰線」月刊，那天，我們還出了慶祝專刊，在會場上贈送與會人士。

慶祝大會揭幕，首由新聞界老前輩、監察院長于右任先生致賀辭，繼之由中國國民黨代表吳鐵城先生及中央通訊社社長蕭同茲先生致詞祝賀。季鸞先生那天身着灰色絲葛長袍，加上一襲黑色羽紗馬褂，神情至爲愉快。

關於慶祝大會的詳情，和季鸞先生在大會不數月後即不幸以多年積勞而病逝，以及他逝世後所得到無比的哀榮等等，在當今身任立法委員，資深名作家陳紀濤先生所寫的「抗戰時期的大公

報」專書中，記載得極爲詳盡。因爲陳先生是抗戰前後大公報編輯部的一員，所以他知之甚多，而且又極爲正確。

不過，筆者也曾參加過那次慶祝盛會，千真萬確地記得有一段季鸞先生的講演辭而不會爲陳紀濤先生所記出的，特爲補記於此。

情理兼顧人人折服

季鸞先生在盛會上當然非常興奮，他曾講到辦報要「成功」，就得不怕「失敗」。他舉了一例：當「抗戰」爆發前二三年，全國一片對日「不惜一戰」，或「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的論調，季鸞先生大不贊成。他在爲文或講演時，力主冷靜沉着，間接暗示中央政府決非不抗日（中共及其同路人在「西安事變」前後，宣傳誣蔑政府不抗日，因爲他們在「第三國際」的指示下，要竭盡可能促成「抗日戰爭」的爆發，中共才得生存發展），而要在準備完成時，才能對日作戰。不然，在國事紛亂如麻，極不統一的大局下，憑藉衝動，就對日作戰，那就很可能取得不可收拾，甚至有「亡國」的危險。

我們要知道，那時期有人如果主張「不抗日」，即可能爲各方責罵爲「漢奸」。但是季鸞先生的文章言論，大義凜然，情理兼顧，任何人不能不折服，更不敢冒然說他不愛國、不抗日。

匆匆執筆至此，回溯往事，季鸞先生的音容宛在，風範猶存，拜讀他的文存，凝思這一代名報人的風格和器識，不禁油然而興無限懷念與敬仰的心情。